

黄河流域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产地研究 ——以郑州商城和殷墟为中心*

黎海超 耿庆刚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黄河流域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产地问题长久以来为学界所关注,迄今未有定论。笔者将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分开研究,全面分析、对比南北各地材料的类型、考古背景,由此提出南方多来源的观点,并进一步对流通的内涵做了阐释。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早、中商时期,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可能来源于盘龙城、吴城、池湖等多个地点,其中有部分产品可能通过盘龙城转运中原。晚商时期,随着盘龙城的废弃,商王朝与长江流域各土著文化之间可能形成了新的资源流通模式。此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来源地也发生一些变化,长江中游的对门山——费家河类遗存和长江下游的南山窑址等均是来源地。在整个商时期,商人在南方不同地区根据需要选取特定类别的产品,又赋予其新的器用制度。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始终是南北资源流通中的一部分,而在这一流通路线中,铜料等金属资源或居于主体,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可能作为附属产品流通。

关键词:黄河流域,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南北交流,资源流通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17)04-0038-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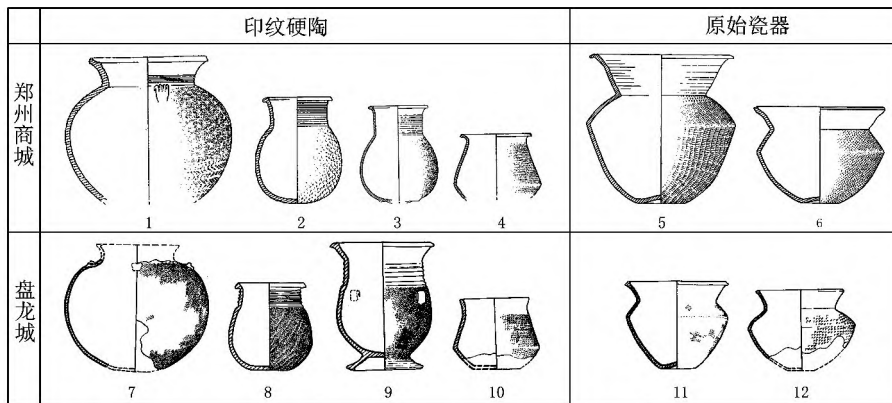
黄河流域出土的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自发现以来便引起学界关注。多数学者意识到这两类器物尤其是原始瓷器的珍稀性,并着力于产地问题的探讨。无论是从科技手段着手还是以传统方法分析,关于两类器物的研究论著颇丰,但尚无定论。总结而言,“南方来源说”^[1]、“北方本地生产说”^[2]是最为主要的两类观点,另外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多产地说”^[3]。可见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源于南方还是北方自产是争论的焦点。

主张“北方本地生产说”的学者可以安金槐先生为代表。他主要对郑州出土的早、中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进行讨论,认为这两类器物符合郑州当地陶器的特征而与南方吴城等遗址的同类器相差较大^[4]。事实上郑州与吴城的材料固然有很多差别,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关联。而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则是郑州

作者:黎海超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出土有烧裂、带有气泡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在将其判断为残品之后,安金槐先生认为将这些残品从东南沿海地区输送到郑州地区显然不太可能。这种表述似乎是目前考古学家提出的“北方本地生产说”的主要依据之一。但笔者认为对待这一材料需持谨慎态度。“残品”的判断标准在现代和古代可能并不一致。在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发展的早期阶段,气泡、裂纹等缺陷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即便到了西周时期,南方屯溪土墩墓出土的完好的原始瓷器上也常见气泡、烧流等现象,而这些墓葬中的随葬品显然并非残品。因此上述论断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持有“南方来源说”的学者较多,最早可以周仁等先生对张家坡墓地西周原始瓷器的研究为代表^[5]。笔者赞同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源于南方的观点,但同时认为以往研究缺乏



图一 郑州商城与盘龙城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对比图

1.罐(C11.H111:12) 2.高领折肩尊(C11T102②:77) 3.尊形器(C7T37②:151) 4.敛口卷沿折腹罐(C5T21①:72) 5.折肩深腹尊(MGM2:1) 6.折肩浅腹尊(C5T4①:18) 7.罐(PLZM3:18) 8.鼓腹罐(PLZH1:15) 9.鼓腹尊(PLWM3:4) 10.折肩斜腹尊(PYWT5④:5) 11.折肩斜腹尊(PLWM6:6) 12.折肩斜腹尊(PYWM7: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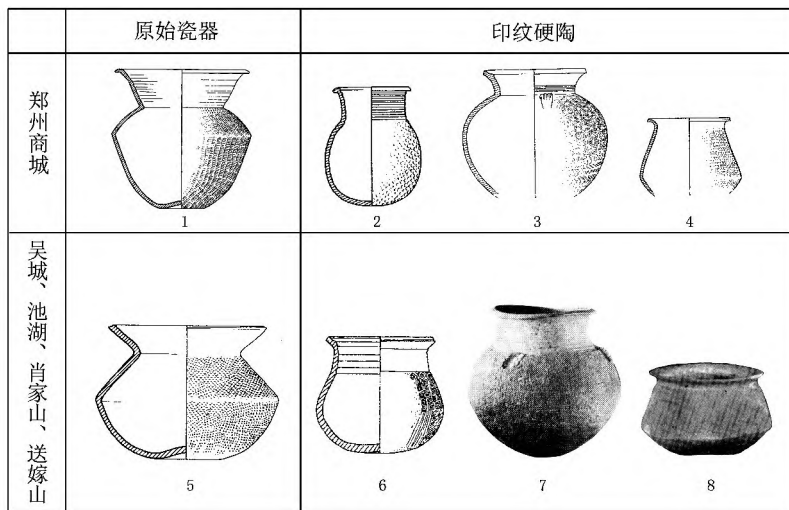
对材料的系统梳理,对于南方各区域间的差异、历时性的变化等认识不清,并缺乏深入探讨。由于以往相关的研究数量极多,本文无意一一探讨。整体而言,无论持有何种观点,以往研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基本考古学分析的缺乏以及科技分析中采样标准的失衡。另外对于产地问题的过度关注使得对于这两类器物其它方面的研究显得疏略,而即便讨论产地问题也多止步于对具体来源地的确定,并未对流通背后的涵义给予足够重视。

笔者认为产地问题实质上属于物料流通的研究范畴。在此类研究中,确立产地仅是研究的基础,还应进一步探索物料流通的文化背景,对于流通的形式、动因、内涵做全面讨论。为实现这一研究目标首先需要流通起点、终点以及流通路线上的材料分别做详细分析,了解流通器物在不同地点的分布、使用情况,再做全面对比。笔者已对黄河流域出土的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进行了全面研究,认为两类器物在早、中商和晚商之间发生显著变化^[6]。因此本文将在早、中商时期和晚商时期两个时间框架内分别讨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产地问题,并尝试对这两类器物流通的文化背景做出阐释^[7]。需要说明的是,黄河流域出土的大部分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均集中于郑州商城和殷墟遗址。早、中商时期,

两类器物在郑州商城之外的其他遗址也有出土,如耀县北村、大辛庄、藁城台西等。这些地区出土的器物与郑州商城同类器保持较强的一致性^[8],因此郑州商城出土的材料可作为黄河流域早、中商时期材料的代表。到晚商时期,殷墟遗址之外罕见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由此笔者在下文的讨论中,将以郑州商城和殷墟遗址出土的材料为中心,分别代表黄河流域早、中商时期和晚商时期的材料。

一、早、中商时期

早、中商时期,黄河流域发现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主要出土于郑州商城遗址^[9],此外在藁城台西^[10]、涿北商城^[11]、郑州小双桥^[12]、邢台^[13]、大辛庄^[14]、耀县北村^[15]、华县南沙村^[16]等遗址也有一定发现。相比而言,南方地区同时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在数量和类型上都更为丰富,如盘龙城遗址^[17]、吴城遗址^[18]、角山遗址^[19]、万年送嫁山^[20]和肖家山^[21]遗址、池湖遗址^[22]、马岭遗址^[23]、闽侯庄边山遗址^[24]以及浙江南山窑址^[25]等。笔者对南北方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分开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南北方材料进行了全面对比。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早、中商时期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所见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中,绝大部分类型均可在盘龙城遗址找到对应(图一)。郑



图二 郑州商城与吴城等地器物对比图

1、5.折肩深腹尊(郑州商城MGM2:1、吴城1986QSWT16③:12) 2、6.高领折肩尊(郑州商城C11T102②:77、池湖积谷山M9:51) 3、7.罐(郑州商城C11.H111:12、万年肖家山) 4、8.敛口卷沿折腹罐(郑州商城C5T21①:72、万年送嫁山M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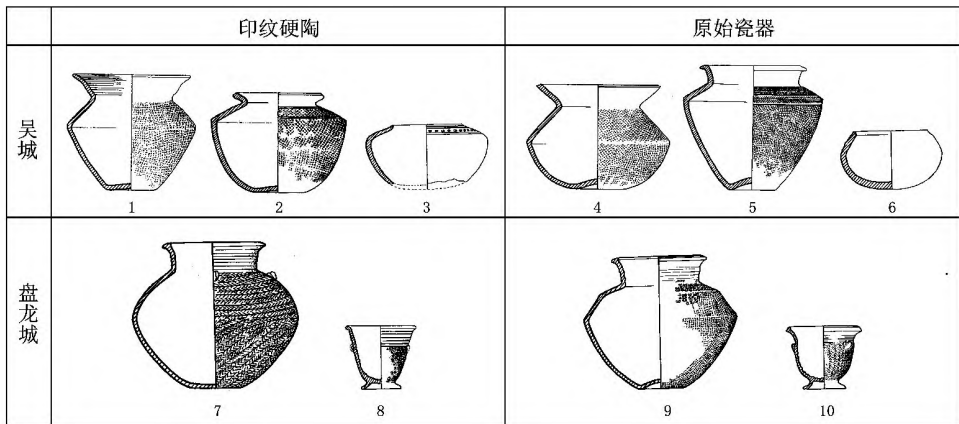
州商城出土的原始瓷折肩尊与盘龙城遗址所见同类器在器形、纹饰上极为一致(图一 5、6、11、12);郑州商城流行的印纹硬陶罐和尊形器与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同类器明显属于同一来源(图一 1~4、7~10)。除盘龙城外,黄河流域流行的原始瓷折肩尊也在吴城遗址等多个地点出现(图二 1、5)。闽西北的池湖遗址还出土与黄河流域多见的印纹硬陶尊形器相似的器形(图二 2、6)。此外郑州商城出土的印纹硬陶圆腹罐和折腹罐均可在万年肖家山、送嫁山等遗址找到对应器形(图二 3、4、7、8)。除以上所列,在闽赣地区其他一些地点也可发现类似的例子。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该区域将发现更多与产地来源有关的证据。

综合早、中商时期南北方各地的材料,笔者认为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在南方地区的盘龙城以及吴城、池湖、万年肖家山、送嫁山等遗址中均可找到对应。其中盘龙城遗址见有黄河流域几乎全部类型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联系到早、中商时期盘龙城遗址当是商王朝在南方地区的控制中心,笔者认为该时期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可能来源于吴城、池湖等多个地点,其

中有部分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可能在盘龙城遗址汇集之后再输往黄河流域,当然也不排除直接传播的可能性。至于盘龙城遗址本身是否也生产这两类器物则尚难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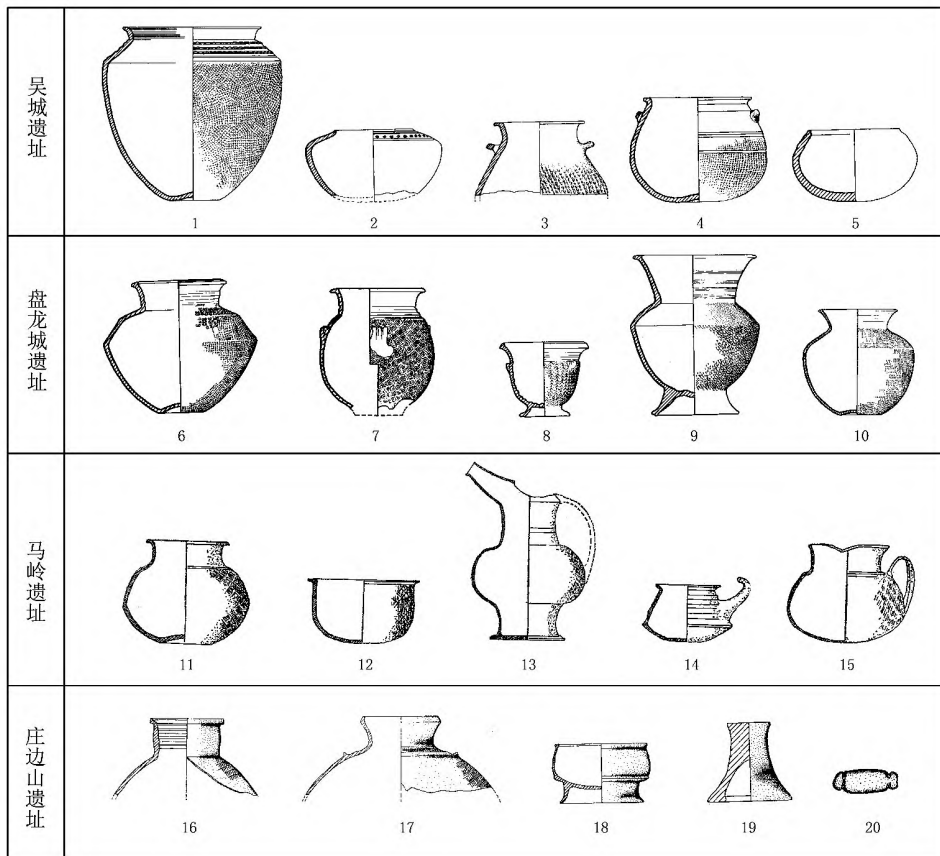
在关于原始瓷器产地问题的讨论中,各类科技手段多有运用。对早、中商时期原始瓷器而言,较为经典的研究可以陈铁梅等先生利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所做的分析为代表^[26]。他们认为商代各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可能是由南方的吴城及附近地区生产,但不排除其它地方试图生产甚至成功生产出少量原始瓷器的可能性。盘龙城原始瓷器应为本地生产,但盘龙城同时使用由吴城地区输入和本地烧制的原始瓷器。可见陈铁梅等先生所得出的结论与笔者的分析结论较为一致。另外金志斌先生利用ICP设备对商周时期南北各地的材料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早、中商时期黄河流域出土的原始瓷器与江西鹰潭角山样品显示出一致特征^[27]。种种证据表明,早、中商时期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当有吴城等多个来源,盘龙城遗址或许发挥着转运中心的作用。

确立了器物的来源地,仍需要进一步理解器物流通的内涵,是单纯器物的流通抑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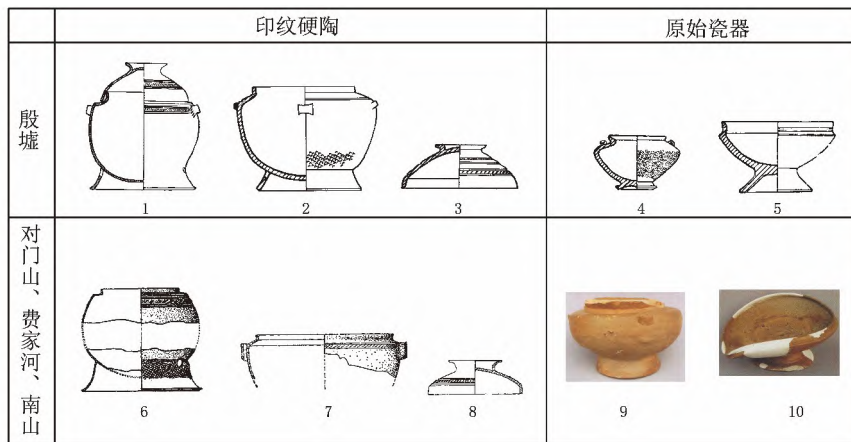
图三 吴城、盘龙城出土器形重合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

1、2、4、5.折肩尊(1986QSWT14③A:5、1973QSW采:1、1986QSWT16③:12、1974QSWT9(A)④:1) 3、6.盂(1975QSWT6③:639、1975QSWT6④:12) 7、9.尊((PLWM3:15、PLWM10:2) 8、10.尊形器(PYZT3⑤:29、PYWM9:5)



图四 早、中商时期南方各地出土的特殊类型硬陶器和原始瓷器

1.矮颈窄折肩尊(1974秋QSWT7⑤:25) 2.(1975QSWT6③:639) 3.垂腹罐(1974秋QSWT7⑤:15) 4.陶盂(1974秋QSWT3④:11) 5.盂(1975QSWT6④:12) 6.双折肩尊(PLWM10:2) 7.鼓腹罐(PWZT9⑧:12) 8.尊形器(PYWM9:5) 9.圈足尊(PLWM1:8) 10.折肩尊(PLZM2:4) 11.高颈罐(M1:1) 12.盂(马岭) 13.长嘴盃(M2:5) 14.带把罐(M1:17) 15.单鋈壶(M1:6) 16.长颈罐(T7③:9) 17.长颈罐(T8③:30) 18.簋(T62③:60) 19.器座(T37③:19) 20.网坠(T62③:8) (5-8为原始瓷器,其余为硬陶器或不确定器)



图五 殷墟遗址与对门山、费家河、南山遗址出土硬陶器和原始瓷器对比图

1、2、6、7.硬陶甗(殷墟武官北地M229:4、殷墟孝民屯M1278:1、对门山遗址T2H7③:34、费家河遗址H1(下):11) 3、8.硬陶器盖(殷墟小屯84XTM34、对门山遗址H1②:46) 4、9.尊(殷墟小屯M1:1、南山T202②:40) 5、10.豆(殷墟84XTH94:3、南山T402⑧: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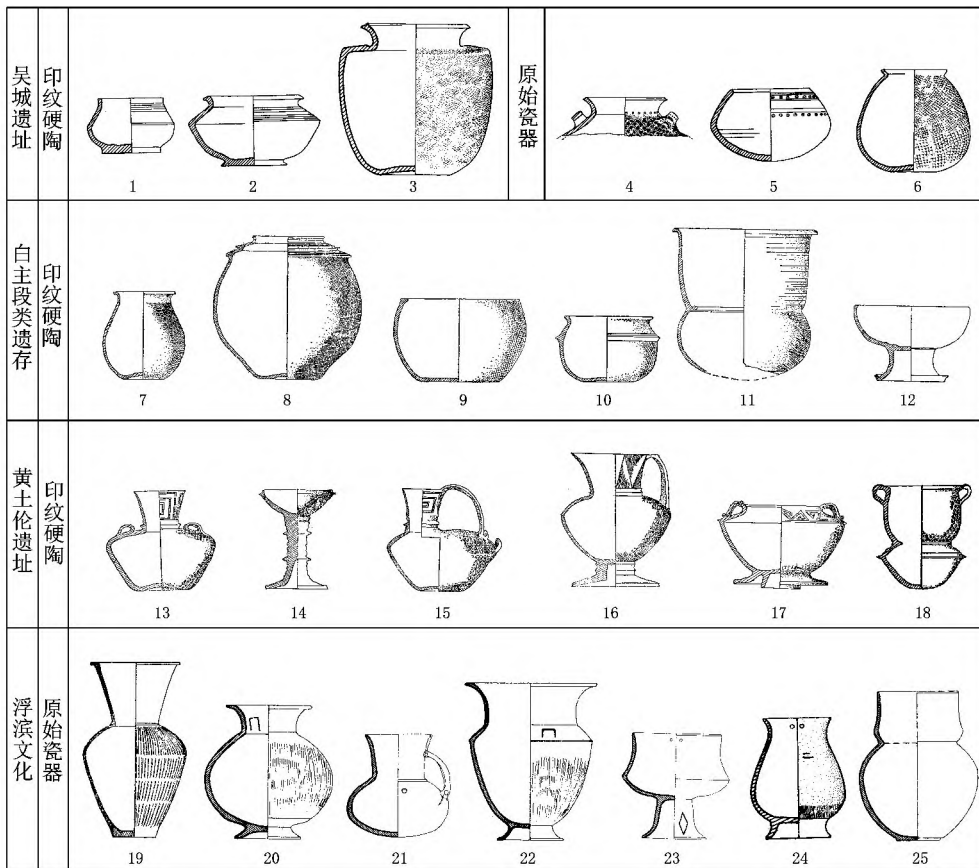
是器物与器用观念的同时传播?这需要掌握这两类器物在流通起点和终点的各自使用情况。根据笔者分析,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类器物,器形上基本不存在重合,使用上也存在显著差异^[28]。换言之,商人对这两类器物进行了有意识的区分和使用。反观南方地区,则多见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器形重合的现象,在使用背景上也未见明显差别(图三)。由此可见,在南北流通中,这两类器物仅是单纯器物层面上的流通,商人则对二者赋予了新的器用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笔者认为黄河流域出土的材料来源于南方多个地点,但总的来说,南方各地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与黄河流域的材料相比区别远大于联系。无论是吴城、盘龙城还是马岭、庄边山等地点出土的器物,有相当部分都不见于黄河流域,一些地点的器物具有显著的当地风格(图四)。也就是说,南方各地大宗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均不见于黄河流域,仅有个别器类可见关联。在可见的联系中,吴城等遗址与黄河流域存在关联的主要是原始瓷折肩尊,而池湖、肖家山、送嫁山等遗址等则与黄河流域的印纹硬

陶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根据这些现象,笔者推测商人对这两类器物的使用可能遵循固定的选择标准:在不同的地区侧重于选取不同器物。因此早、中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流通过程是,商人在南方的吴城、池湖、肖家山、送嫁山等多个地点根据需要选取器物,其中有部分器物或许通过盘龙城遗址转运至黄河流域,也可能直接进行传播。对于所获取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商人又建立了新的器用制度。

二、晚商时期

晚商时期,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基本都出于殷墟遗址^[29]。南方地区的材料可以湖南的对门山—费家河类遗存^[30]、浙江的南山窑址^[31]、粤闽的浮滨文化^[32]、闽西北的白主段类遗存^[33]、闽东的黄土伦文化^[34]以及江西的吴城文化^[35]为代表。通过对南北方材料进行系统的对比,笔者认为殷墟遗址所见的一类形制特殊的硬陶甗当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对门山—费家河类遗存(图五,1、2、6、7)。这类硬陶甗在当地发现数量较多,当是具有土著风格的器物。另外殷墟所见的硬陶器盖也可在对门山—费家河类遗存中找到对应



图六 晚商时期南方各地特殊类型硬陶器和原始瓷器

1. 孟 (1974秋QSWT7⑤:59) 2. 孟 (1974QSWT9(A)③:33) 3. 罍 (1974QSWT9(B)③:13) 4. 罐 (1979QSW采:3) 5. 甗 (1986QSWT18③:20) 6. 垂腹罐 (1986QSW(E)T5J1:3) 7. 长腹罐 (M5:4) 8. 尊 (M3:3) 9. 钵 (M5:2) 10. 釜 (M4:2) 11. 甗 (M5:3) 12. 豆 (M5:1) 13. 杯口双系壶 (M1:4) 14. 豆 (M2:4) 15. 鬲形壶 (M3:13) 16. 圈足鬲形壶 (M7:3) 17. 罍形器 (M3:11) 18. 甗 (M18:3) 19. 大口尊 (广东饶平古墓) 20. 圈足大口尊 (金采:2) 21. 带把壶 (结采:5) 22. 圈足大口尊 (金采:1) 23. 深腹豆 (M7:5) 24. 陶圈足壶 (M1:5) 25. 葫芦形壶 (金采:15)

(图五 3、8)。殷墟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尊和豆与浙北南山窑址出土的原始瓷器一致,该地当同为来源之一(图五 4、5、9、10)。此外也不能排除其它区域作为来源地的可能,这有赖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可见晚商时期,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来源发生一些变化,但依然源于长江中游、下游的多个地点。

从流通器物的类型来看,在对门山—费家河类遗存中,硬陶甗的器形也有很多施有黄白或青灰色釉的原始瓷器形式,但商人仅选取了其中的硬陶甗。东苕溪原始瓷窑址群出土的遗物以原始瓷豆为主,另有罐、器盖、簋、尊、盆、盘、钵、孟等各种器形。尽管类型丰

富,但其中可能流通至黄河流域的仅有豆、尊等有限的类别。可见晚商时期商人对于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依然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除以上地点外,南方其他地区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与黄河流域的材料相比则罕见关联,吴城、白主段、黄土伦、浮滨文化等所见器物均各具特色(图六)。

综合早、中商和晚商时期的情况,可见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尽管都源于南方的多个地点,但具体的来源仍有一定差异。与来源地变化相应的是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在器形、使用上也有根本性变化^[36]。早中商时期流行的原始瓷折肩尊已经消失,原始

瓷豆、罐成为主要器形。早中商时期流行的印纹硬陶尊形器等器形不见于晚商时期，以硬陶甗和罐为代表的器形在晚商时期开始流行。除器形之外，两类器物的功能也发生较大变化。早、中商时期，原始瓷折肩尊主要随葬于高等级的铜器墓葬中，可能作为酒器使用。晚商时期原始瓷器变的极为少见，晚商后段才有一些发现，且多不见于墓葬中，器形也变为以豆、罐类为主的食、水器。印纹硬陶在早、中商时期主要出于居址中，但晚商时期开始较多的出现于妇好墓等高等级墓葬中。

以上变化发生在中晚商之际这一特殊节点，理解这种变化还需考虑当时的考古学背景。从商文化的分布范围来看，商文化在历经早、中商时期的扩张之后，到晚商时期除在山东地区有东进趋势外，其他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的商文化普遍内缩，最具代表性意义的是盘龙城遗址的废弃。笔者认为盘龙城遗址在南方的一个重要作用当是作为商王朝的资源集纳据点存在。通过盘龙城这一桥梁，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形成了资源、文化交流通道。其中铜料资源可能是南北资源流通的主要内容，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或许只是流通过程中的附属产品。随着盘龙城遗址的废弃，长江流域各地出现了三星堆、宁乡、新干等各具特色的铜器群，各地土著文化兴起。显然对南方地区失去控制的商王朝，无法继续以直接设置据点的方式来获取资源。反观长江流域，尽管各地土著文化差异显著，但以长江流域式尊、鬲为代表的器物可将长江流域串联为一体。高放射性成因铅类型的原料又普遍见于殷墟以及长江流域各铜器群，这类重要的金属原料将南北关联起来。种种现象表明，此时商王朝与长江流域之间可能形成了一种以铜料资源、铜器技术、用铜观念为主要载体的新的资源、文化互动关系。在这种资源流通体系的变化中，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作为流通资源的一部分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追本溯源，商文化的变迁可能推动了南北文化交流模式的变动，从而影响到印纹硬

陶和原始瓷器的来源。两类器物来源的异动反之又可能造成商文化内部所用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在器形和使用上都发生较大改变。当然，支持这一因果论断还需更为充足的证据，此处仅是提出一种尝试性的解读。

三、结语

黄河流域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产地问题历经多年争论而“始终无果”，这与研究方法和思路上的问题不无相关。物料流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单纯以绝对的“北方说”或笼统的“南方说”概以论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并无裨益。以往的研究中竭力在南北各地寻找完全对应的材料，由此而忽视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联系，这种思路是建立在单一来源地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黄河流域出土的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源于南方当无疑问，但并非来自单一地点。早、中商时期的材料主要源于盘龙城、吴城、池州等多个地点，其中可能有部分器物通过盘龙城转运至黄河流域。到晚商时期，随着盘龙城遗址的废弃，长江流域各地土著文化兴起。商王朝与长江流域土著文化间可能形成了新的资源流通体系，此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来源地发生一些变化，但依然来自包括长江中游对门山—费家河类遗存和长江下游南山窑址的多个地点。来源地的变化又进一步促使这两类器物在器形、使用上的改变。无论是早、中商时期还是晚商时期，商人均对这两类器物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并确立了新的器用制度。就文化背景而言，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可能只是当时南北资源、文化交流中的“次要产品”，金属资源才是流通中的主要内容。由此，我们可基本了解这两类器物的整个流通过程。

物料流通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对于物料具体产地的确立仅是研究的首要一步，而不能局限于此。唯有对流通器物在起点和终点分别进行全面的分析、对比，并对流通的具体内涵和文化背景进行阐释，才能将这

一课题的研究从对“物”的观察升华到对“人”的研究。

*本文受到“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20827041A4155)”、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青年基金项目(17XJC780001)”(两周青铜器生产、流通问题研究)的资助。

注释:

[1]周仁、李家治、郑国圃:《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的研究》,《考古》1960年第9期,第48-52页;罗宏杰、李家治、高力明:《北方出土原始瓷烧造地区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96年第3期,第297-301页;陈铁梅、Rapp G. Jr.、荆志淳、何鹭:《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第39-52页;陈铁梅、Rapp G. Jr.、荆志淳:《商周时期原始瓷的中子活化分析及相关问题讨论》,《考古》2003年第7期,第69-78页。

[2]安金槐:《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文物》1960年8、9期合刊,第68-71页;安金槐:《谈谈郑州商代的几何印纹硬陶》,《考古》1960年第8期,第26-28页;李科友、彭适凡:《略论江西吴城商代原始瓷器》,《文物》1975年第7期,第77-84页。

[3]朱剑、王昌燧等:《商周原始瓷产地的再分析》,《南方文物》2004年第1期,第19-22页。

[4]安金槐:《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文物》1960年8、9期合刊;安金槐:《谈谈郑州商代的几何印纹硬陶》,《考古》1960年第8期。

[5]周仁、李家治、郑国圃:《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的研究》,《考古》1960年第9期。

[6]黎海超:《黄河流域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3期。

[7]本文分期框架采用唐际根先生的观点,参见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第393-420页。

[8]同[6]。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673-674页。

[10]河北省博物馆等:《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文物》1974年第8期,第42-50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第296-358页。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第2页。

[13]唐云明:《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第43-50页;唐云明:《邢台尹郭村商代遗址及战国墓葬试掘报告》,《文物》1960年第4期,第42-46页。

[14]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第12-27页。

[1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耀县北村遗址发掘

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第12-16页。

[16]张忠培:《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第297-327页。

[17]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1963~1994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1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

[19]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鹰潭市博物馆:《鹰潭角山商代窑址试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2期,第32-43页。

[20]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62年江西万年新石器遗址、墓葬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63年第12期。

[21]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万年县博物馆:《江西万年类型商文化遗址调查》,《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61年江西万年遗址的调查和墓葬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22]福建博物院:《福建光泽池湖商周遗址及墓葬》,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23]福建省博物馆、光泽县文化局文化馆:《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年第12期,第1095-1107页。

[24]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闽侯庄边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期,第40-45页;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庄边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第171-226页。

[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群》,《考古》2011年第7期,第3-8页。

[26]陈铁梅、Rapp G. Jr.、荆志淳、何鹭:《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第39-52页。

[27]金志斌:《部分商周遗址出土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的ICP-AES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78页。

[28]同[4]。

[29]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第2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第27-24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虚妇好墓》,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徐广德:《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第36-4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商代墓葬1989~1990年第发掘》,《考古》2009年第9期。

[30]湖南省博物馆、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岳阳市文物所:《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场的发掘》,《考古》1985年第1期;郭胜斌、罗仁林:《岳阳县对门山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6,第73页。

[3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考古》2011年第7期，第6页。

[32]广东省博物馆、饶平县文化局：《广东饶平古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广东省博物馆、大埔县博物馆：《广东大埔县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11期。

[33]福建省博物馆、光泽县文化局文化馆：《福建省光

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年第12期，第1095~1107页。

[34]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第23~37页。

[3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36]同[4]。

Provenance Study of the Stamped Hard Pottery and Porto-porcelain of the Shang Dynasty Unearthed from the Yellow River

—Focusing on Zhengzhou Shang city and Yinxu

Li Haichao Geng Qinggang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Shang Dynasty's hard-stamped pottery and proto-porcelain found in the Yellow River has caught scholars' attention since its discovery yet no conclusion has been proposed to their origin. The artifacts were first separated according to the pottery type then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archaeological background from both South and North were executed.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these artifacts originated from various locations in Southern China.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Shang Dynasty, the production sites of these two vessels include Panlongcheng, Wucheng, Chihu and other sites. Some of the products were likely transferred through Panlongcheng to the Central Plains. With the collapse of Panlongcheng during the Late Shang Period, new types of resource circulation model were likely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Shang Dynasty and native powers in the Yangtze River. Duimenshan-Feijiahe and Nanshan Sites became the new loc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the Shang people organized certain types of product to be made in specific places thus increasing the control of these artifacts with new standard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two artifact types were part of the various resources circulated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In this circulation route, metal resources like copper were the players in trade while the stamped hard pottery and proto-porcelain were secondary in importance.

Keywords: Yellow River, Shang Dynasty, Stamped Hard Pottery and Proto-porcelain,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Resource Circulation

(责任编辑、校对: 段姝杉)